

種風險，而救濟軍民糧食的目的，亦將難於達到。

(二)我國田賦制度，原已紊亂不堪，數年整理，迄未澈底革新，然因係以貨幣徵收，計算尚便。現在改徵實物，則於鑑定成色等級及過斗過秤之際，手續必極煩瑣，轉足增加稅務行政上之困難，而稽核不易周詳，胥吏從中舞弊，恐亦無法避免。

以上三項困難，都是值得我們嚴加注意的。至如其他所謂田賦改徵實物違反進化原則，人民在心理上必覺負擔加重，法幣信用將受打擊等等，則時人反覆討論已多，大致均不成嚴重問題。法幣的使用，遍及於人民的全部經濟生活，田賦改徵實物以後，一切交易依然以法幣為中介，斷不致因以實物納賦之局部改變，而即使其信用為之動搖。

針對着以上種種困難，我們建議至少應從事下列各項準備：

(一)完成倉庫組織。現在若普設新倉，當為事實之所難能，勢非利用現有機構不可。在原有公倉民倉的地方，於徵收糧食之後，即可由管理機關分別指定，寄存登記。內地有不少縣份，已經設立了合作金庫及農業倉庫，亦可轉借應用。在未設立的各縣，可將公產廟宇祠堂等，酌加修理，以應急需。總之，務須對於現有一切機構加以充分的利用，以解決糧食儲存問題。

(二)籌置運輸工具。運糧以水道為佳，在沒有水道的地方，現在多藉助於人力與畜力。惟人畜運輸，困難殊多，天雨泥濘，行走不便，每屆農忙，運代缺

中國計劃經濟的途徑

——甘乃光先生主張聯營企業計劃經濟方式的介紹——

甘乃光先生在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重慶中央日報的每週專論中，發表了一篇「中國計劃經濟的途徑」，他以為在中國現狀之下，國家經濟事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生了決定作用，纔能由經濟計劃到計劃經濟的途徑。其實行的辦法，甘先生說：「就是中國各大部門的經濟事業，組織成

乏，馱載數量，不能過重；速率遲滯，難期迅捷；而沿途支用浩繁，尤不經濟。以是之故，以應多置車輛，如板車、馬車之類，以代替人力與畜力，並隨時發動各官營商營運輸機關，通力協助，較為適宜。運輸便利，乃達成田賦改徵實物目的的主要條件，這是需要集結各方力量來切實準備的。

(三)確定徵收制度。田賦改徵實物，原則上應將徵收與經收兩部份互為劃分，彼此牽制，以免流弊。這在上述中央對於川省的四項指示中，已有規定，各地自應照實行，姑不具論。至於度量衡單位之如何統一，糧食的成色與等級如何鑑定，以及各種雜糧的折率如何計算等，這些都是稅務行政上極複雜的問題，必須邀集專家，早作規劃，以免臨事倉皇。改徵實物手續較繁，那是無法避免的。

總之，實施田賦改徵實物，是難免要遭遇着不少的困難的，對於這些困難的克服，須從技術設備上痛下一番準備工夫。不過，改徵實物，並不完全是——一個技術問題，它和政治經濟各方面亦大有關係。在開始實施的階段上，除了應從事各項技術準備以外，對於如何培植幹部人材及改進基層政治，亦應特別予以注意，要把它推行盡利，不僅需要各級政府機關把握事實，分頭並進，我們每個國民亦是負有責任的。

三十二，九於重慶。

史可京

為一個全國性的大聯營企業公司，在一省或二省以上的經濟區域，各設立一聯營分公司，除接受現有之工礦農商加入外，並添設其他所必需經濟事業部門，各部門的公司，分別經營，統合設計，並將區省以下的縣市，如有需要，也分佈有分公司，除了地域的公司外，並可以組織國家一業的聯營企業公

我們十分贊同甘先生的主張，因為時至今日，中國經濟依然深染着地方色彩，而處於被動的地位，亦即因此，故中國迄未工業化，迄未高度資本主義化，故欲行經濟統制，總是茫無頭緒；換言之，中國既未高度資本主義化，一切經濟形態，尙是零星散漫，故無從仿照英德諸國，由資本家手裏取得統制之權，中國人民的信仰與蘇聯不同，習俗不同，環境尤為不同，故中國亦實不能步着蘇聯的後塵，也來一個大破壞、大革命。甘先生主張的企業聯營計劃，經濟方式正是孫中山先生所謂的「迎頭趕上」的辦法，何以如此，即因其有以下數大功能之故：

(一) 資本問題適當解決——中國所以沒有工業化，其重大原因之一，在乎缺乏資本，因無資本，所以需要外資，亦即因利用外資——在一種不利的條件之下——而喪失了領導之權，以致戰前中國僅有的工業，也多誤入歧途。中國很富，但這種富是隱藏的，是分散的，中國的民族資本很為龐大，但是缺少一個有效的集聚機構，組織健全的聯營企業公司正適合這個要求，它不但視事實情況伸足於全國各個地區，且因政府種種的維護——如保本保息等而有一種優異的利潤誘力，即此足以使每個國民發生興趣，竭誠的願將其可能的資力投放於其最近的一個企業公司（華僑投資當尤多）。你這樣想：若每一個國民平均每年有十元的投資，則全國集合起來就有四十五萬萬元之多，如果政府再能計劃的擴張信用，能使每一個國民的可變資本相對增加，則因資本再生產的作用，中國的民族資本大可以瞬息十倍，資本原來像一條大河，流得愈遠，水量亦愈大，所以當我們的民族資本集聚得相當可觀時，即使有大量外債的借入，它只能為我所用，而不會再為它所用，這正如嘉陵江的水流入長江，即變為長江之水的道理一樣，企業聯營，將全國的資力很巧妙的集聚起來，恰好完成這一個偉大任務。

(二) 各種產業理想發表——在企業聯營之下，因為政府和人民一樣的向企業公司投資，而做了較有權限的股東（因為資本金大），故政府實可以計劃全國各聯營企業公司的業務，因此，全國性的聯營企業總公司在政府控制之下，實可以決定全國經濟活動的方向。例如政府的政策是「經濟

建設以國防為中心」，則聯營企業總公司，當以建立重工業、動力工業等為着重之點；又如政府希望「農、工、交通、貿易平衡發展，相互為助」，則聯營企業總公司，當可將其投資平均分配於以上各業，再如政府計劃分區生產，亦即避免既往只重外沿忽略內裏的弊端，則聯營企業總公司，當視自然環境，分全國為若干實業區——一省一實業區或一實業區數省——而於每一實業區設立一聯營企業分公司，及各種單獨的企業公司，分別緩急經營，各該區之經濟事業，換言之，某一實業區，應有某一種或數種特殊重要的實業，及其附帶的實業。例如以包頭為中心的內蒙區，應以畜牧事業為主，而有龐大的羊毛打包公司、毛織公司、皮革製品公司等，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流域區，應以絲糖為主，而有龐大的絲織、製糖公司等，各區之主要事業，因要以世界市場為目標，或以全國為對象，至各該區之農業及輕小工業，亦應以滿足本區的需要為理想。尤為要者，因為經濟建設以國防為中心，為了加強工業的國防力量，如四川的煤鐵雖不太豐，亦應設法利用本區之動力，而輸入附近各區之煤鐵，以建立較大之後防軍需重工業，此唯企業聯營是賴。

(三) 對外競爭地位優越——因為我們經濟建設的範圍太廣，也正因為我們所希望的太切，希望能於短期內完成各種事業的基礎，所以在建設的開始，一定同時需要大批機器與技術的購入，此等大量外匯的動用，固然一方面要靠外債，但大部份亦即最後的負擔，勢將由吾全體國民所承受，因此，國內的生產須有計劃，須將全國生產分為國內消費與國外輸出兩大類，即須有一大部份產品——尤其如茶、絲、桐油、羊毛、錫、鎢等特殊貨物——應專門移作換取外匯之用，品質須精之再精，價格須低之再低，務必霸佔世界市場的一個角落，方肯罷休。同時國內人民的生活，在相當時期之中，其消費方式應該受到適當的局限，以便集全力於基本實業之建設，以求永遠。若果全國企業聯營，這個雙重目標便可以完全達到，因在企業聯營之下，政府可設立一全國性的對外貿易總公司，以可能大的資力與外力相週旋，同時國內的生產既有計劃，足以統制，國內市場上的供求均衡，物價甚形安定，再加上政府種種的扶助——如匯兌統制、輸入許可制之實行等，故一般外來的消費物品，實不容許其任意侵奪中國本身的市場，這樣，中國的經濟建設纔

可以根深蒂固

(四)應付國家緊急措施——甘乃光先生在伸述他的辦法後，又謂：「我們的理想，在中央聯營企業總公司及全國一業的聯營公司，與省區聯營分公司組織之下，各經濟部門的運營，既能統一集中在一總計劃之下來行動，一旦國家有事需要動員的時候，命令一下，就可以馬上動員，即在平時，如國家需要某種物品，以防舶來品之傾銷，也可以有充分應付力量，這樣，國防經濟與經濟國防的鞏固，自不成問題了。」對的，因為國家經濟事業管理之集中，在國家經濟行政上至為便利，故全國企業聯營，足以應付國家種種的緊急措施，前在第二節中業已論及，若就目前戰時而論，吾人更可舉例以明之，例如物價統制，因為管理的有力，政府當可以一種壓力，使全國各種生產事業，按戰時的需要而生產，並可用一種保護政策——如補助金、保本、保息等，令各個公司的利潤率相對降低（至少須穩定），以便各種日用必需品的價格依成本換算而穩定於一合理的狀態，同時，因為信用隨着全國經濟活動的方向，而深受着政府的支配，故通貨之惡性膨脹當可避免——因為政府徵收、募債、抽稅等較易，當為物價統制最基本的一着，再如今日吾國之對敵經濟作戰，因為我方經濟組織之健全與力量之集中，敵方實無從伸足於吾勢力範圍之內，而深受着不可抗之排擠，自不待言！

(五)民生主義終極實現——「民生主義」的三個立足點，是平均地權、節制私人資本與發達國家資本。欲實行平均地權，必須由土地問題最癥結之點做起，中國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，是為地權不能均分之因，亦乃農村經濟最基本之病態。據美國農部培克耳博士 (Dr. D. E. Baker) 的推算謂：「中國最大可能的農地面積，不過佔全國土地面積的百分之二十九。」換言之，目前農地面積（據二十四年申報年鑑統計，全國共約有作物耕地十三萬萬餘畝，森林地畜牧地無統計）盡可能的擴大，至多不過到四十五萬萬餘畝，其中二十萬萬畝為耕地，十五萬萬畝為牧地，

十萬萬畝為森林地。再依據伊士特教授 (Prof. E. S. East) 的估計，一人欲維持適當的最低生活程度，則至少需地二英畝半（即十六華畝），故此為標準中國靠耕地為生的人口，至多不過到一萬二千五百萬人，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七，森林地以每人平均二百畝計，約可容納五千萬人，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十一，牧地以四百畝足以維持一人之生活計，約可容納三千五百萬人，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。故農村中之剩餘人口（除移植植林牧事業之一萬一千萬人外），還有一萬二千五百萬人，尚待比例的分配於工商交通事業等方面。而今全國經濟在聯營企業總公司控制之下，既然作平均的發展，大量勞工之迫切需求，將使此等大量的農村剩餘人口有了出路。農村人口減少之後，土地利用纔可以相對擴大，纔可以進達於「耕者有其田」的理想境界！在企業聯營之下，我們容許私人資本的存在，但因國家資本的力量甚大，遠能支配其發展之方向，故此私人資本受了有利的節制，甚至能夠與國防經濟的發展齊頭並進，當然，在企業聯營之下，因為政府事前計劃的週詳，因為政府的實力日增，故國家資本日益在長進之中，當國家經濟事業——國家資本經營之事業——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發生了決定作用——亦即國家資本發達到了高度，是為中國計劃經濟實現的時候，亦即民生主義實現的時候。

最後，我們敢再鄭重介紹：甘乃光先生主張企業聯營的計劃經濟方式，實為一個至為切要的「迎頭趕上」辦法，其他的方式，多是經濟計劃，而不是計劃經濟，多偏於空想，並不合乎中國的需要。二十八年六月貴州省成立了貴州企業公司，目前雲南川康福建廣西等省也在仿效，中央亦正積極進行設立各種企業公司，願有資本的國民多多投資，竭誠的為中華民國而努力！

三十年二月二十日於渝南京